

《鬻子》与贾谊《新书》互文考

[香港] 潘铭基

摘要：《鬻子》一书，题为楚祖鬻熊所撰。学者多以为伪，盖《新书》所引“鬻子曰”各条，均未见于今本《鬻子》。然而，岂必题为“鬻子曰”者，方为《鬻子》？俞樾、刘师培等校勘贾谊《新书》，疏理二书相合者，却得见两书内容重复者多则，是《鬻子》确有见于贾谊《新书》者也。本文即以二书互文部分为证，以见今本《鬻子》成书年代之下限。

关键词：贾谊；新书；鬻子；伪书；互文

中图分类号：G256.3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2-0025-06

一、《鬻子》著录及其真伪之讨论

《鬻子》一书，刘勰以为乃子书之祖，并谓此书乃周文王与鬻熊之对话录。^①俞樾云：“《鬻子》一书，为子书之祖。然文多错误，其篇第尤不可解。”^②此书流传至今已断烂不堪，颇难卒读。历代书志关于《鬻子》之著录，不尽相同，其中卷数、部类归属各异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尝载《鬻子》、《鬻子说》二书，惟今仅存《鬻子》一书凡14篇，与宋代《崇文总目》所见相同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前人论说基础之下，考辨《鬻子》真伪。究其要者，约有数端：

1. 四库馆臣以为《列子》曾三引《鬻子》，^③“皆黄老清净之说”，与今本《鬻子》相异，疑为《汉志》道家《鬻子》遗文。

2. 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》所引“鬻子曰”六条，风格略同，疑为《汉志》小说家《鬻子说》遗文。惟史称周文王初见鬻熊时年九十余，贾谊《新书》却载其与周成王及鲁周公语，时代未必相及。^④《提

收稿日期：2009-12-21

作者简介：潘铭基（1977-），香港人，哲学博士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、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名誉副研究员，专研先秦两汉典籍。

①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云：“至鬻熊知道，而文王咨询，余文遗事，录为《鬻子》。子自肇始，莫先于兹。”（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卷4，香港商务印书馆，1960年，第308页。）张舜徽云：“考周秦诸子之书，著录于《汉志》者，在《鬻子》之前，尚有《伊尹》、《黄帝》、《孔甲》、《大禹》、《神农》、《力牧》诸书，是不得谓《鬻子》为子书之始也。特直名其书为某子，则以此为最早耳。”（张舜徽《汉书艺文志通释》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84页。）据此，刘勰所谓子书肇自《鬻子》，恐未必然，惟子书之称作“子”者，则当以《鬻子》为先矣。

②俞樾撰、李天根辑《诸子平议补录》，台北世界书局，1958年，第1页。

③案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为《列子》引《鬻子》3次，其实当为4次，分见《天瑞》、《黄帝》、《力命》、《杨朱》诸篇。

④严可均关于“鬻子年九十见文王”之考辨，可供参考。严氏云：“鬻子年九十见文王，而其书有成王问及康叔封卫事，盖《鬻子》非鬻熊一人之语。案：《史记·楚世家》曰：‘鬻熊子事文王，早卒，其子曰熊丽，熊丽生熊狂，熊狂生熊绎。熊绎当周成王之时，举文、武勤劳之后嗣，而封熊绎于楚蛮’，‘熊绎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牟、晋侯燮、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。’又曰：‘熊通怒曰：‘吾先鬻熊，文王之师也，早终。成王举我先公，乃以子男田令居楚。’‘云早卒、早终者，谓鬻熊未及受封而卒、而终，非不寿之谓也。盖文王师为鬻熊，成王问为熊绎，中间隔熊丽、熊狂两世，《鬻子》非专记鬻熊之语，故其书于文王、周公、康叔皆曰‘昔者’。‘昔者’，后乎鬻子言之也。古书不必手著，《鬻子》盖康王、昭王后周史臣所录，或鬻子子孙记述先世嘉言，为楚国之令典，即《史记·序传》所谓‘重黎业之，吴回接之，殷之季世，鬻熊牒之。周用熊绎，熊渠是续’者也。昭十二年《左传》楚灵王曰：‘昔我先王熊绎，跋涉山林，以事天子。’是楚之始封为熊绎，非鬻熊，与《楚世家》正同。”（严可均《铁桥漫稿》卷5，台北艺文印书馆，1971

要》疑《鬻子》或出鬻熊后人，事涉虚构，故《汉志》列入小说家。

3. 北齐阳休之序录伪《四八目》未有载《鬻子》所列之帝王辅佐大臣，《提要》据此以为“似乎六朝之末，尚无此本，或唐以来好事之流，依仿贾谊所引，撰为贗本，亦未可知”。然《提要》复谓贾谊《新书》所引“鬻子曰”，全不见于今本《鬻子》，并得出“岂非有心相避，而巧匿其文，使读者互相检验，生其信心欤”之结论，正与“依仿贾谊所引”一语自相矛盾。

4. 四库馆臣再就《鬻子》一书标题“甲”“乙”立论，以为乃“佚脱错乱之状”，“古无此体”，因为属伪书无疑。

5. 以为今本《鬻子》“每篇寥寥数言，词旨肤浅，决非三代旧文”。

近人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亦云：

余谓鬻熊为楚之先，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，事迹无考。《史记》言鬻子事文王早卒，而《汉书》言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，其说不同，已难凭信，然要之不及见成王。今贾谊《新书》记鬻子对成王者凡五条，显由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自注“鬻子为周师，自文王以下问焉”之语而依傍为之。《列子》则任意自撰道家语，分属古道家，非必有据。盖《新书》《列子》皆伪书，今本《鬻子》不见《新书》及《列子》所引文，不足证今本《鬻子》之伪。《汉志》著录之《鬻子》，当为战国时所依托，而今本《鬻子》，如《四库提要》所言，唐以来依仿贾谊所引，撰为贗本，则毋宁谓今本《鬻子》，与今本《新书》，皆唐以来人所依托，而其有心相避，或者竟出于一手，亦未可知也。^①

黄氏所云，大抵根据前贤所述，以为今本《鬻子》乃伪书。黄氏更因此推断《鬻子》、《新书》同为伪作，而作伪者同属一人。惟此说可商，未可尽信。^②其中以为“《新书》《列子》皆伪书，今本《鬻子》不见《新书》及《列子》所引文，不足证今本《鬻子》之伪。”其推论过程，则未免武断。

总之，古今学者俱以为今本《鬻子》乃是伪书无疑，惟其中所列证据，实有可商之处。如黄云眉推断乃唐人所伪撰，其罗列之证据虽丰，却未足以取信。下文细意比勘今本《鬻子》与贾谊《新书》，可见二者实有互见关系，此可证前人有关《鬻子》、《新书》“有心相避”之论说并不可信；准此，《鬻子》之成书年代亦可重新考虑。

二、《鬻子》与贾谊《新书》之互见关系

前贤谓贾谊《新书》所引“鬻子曰”凡七条俱不见于今本《鬻子》，便论定《鬻子》为伪书。细考前贤所论，无非仅就《新书·修政语下》一篇立说，篇中引文王问于鬻子一次、武王问于鬻子一次、成王问于鬻子五次，皆不见于今本《鬻子》，此说无误。惟今本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之互见关系，却是辙迹可考。

校勘学家多以《新书》与《鬻子》互校，如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《新书》、王耕心《贾子次诂》^③、刘师培《贾子新书斟补》等均尝以《鬻子》斟正《新书》，多有卓见。反之，钱熙祚《〈鬻子〉校勘记》、俞樾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则以《新书》校勘《鬻子》。惜诸家未有将其校勘成果反驳前人旧说，惟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之互见关系，自可考见。前贤虽多用《新书》勘斟《鬻子》，然而始终未有以之道出二书之互见关系。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尝谓《鬻子》逢行珪本与《新书·大政篇》所引六条甚相类；陈自力引而申之，云：

年，第18页。）严氏所云，自有依据，子书之成，多非出自一时一人，《鬻子》或亦如是。

①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，济南齐鲁书社，1980年，第120页。

②关于《新书》成书年代及真伪之意见，学者众说纷纭，然若取《汉书·贾谊传》及《新书》对读，当见《新书》文字较为完整，当为《汉书·贾谊传》所本，然则《新书》当亦成于班固撰书之前，似当不为唐人所伪撰。《新书》真伪之问题，详参拙著《贾谊〈新书〉与〈汉书〉互见关系考略》，《台湾书目季刊》第39期（2006年3月），第1-16页。

③案：王耕心校勘《新书》多据前人成说，少有新论。此处尝据《鬻子》以校《新书》者四条，其中三条只据卢说，余一条亦据卢本文字而立说。（王耕心《贾子次诂》卷9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王氏龙树精舍刻本影印，1995年，第24a-25a页。）

细检二书，具体情况如下：《大政上》有两段文字分别与逢本第 6、14 篇大致相同，《大政下》有两段文字分别与逢本第 4、5 篇大致相同，《修政语上》有两段文字与逢本第 8 篇略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《新书》上述 6 段文字均未提到鬻子，倘若逢本真是后人依仿《新书》而伪造的贗本，则作伪者理应抄录《修政语下》的 7 则文字，而不应抄录这 6 段看上去与《鬻子》毫无关系的文字。[……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‘谊书所引，则无一条偶合。岂有心相避，而巧匿其文，使读者互相检验，生其信心欤？’纯属臆测，失之粗矣。^①

顾、陈所言大抵有理。顾氏所云，起提纲揭领之效，惜未有确切指出何处相类，且互见之处亦绝非尽在《大政》；陈氏申述，言之有物，惜未有结合前代校勘成果，分条缕析，细加评鉴。今据顾、陈二人所论，考《鬻子》其中五篇与《新书》有互见部分，兹分五表条列如下，并胪列校勘诸家众说，以证成二书之互见关系：

例一：《鬻子·曲阜鲁周公政甲第十四》与《新书·大政上》

鬻子	政曰：昔者鲁周公曰：吾闻之于政也，知善 不行者谓之狂
新书	知善而弗行 谓之狂
鬻子	知恶 不改者谓之惑。 夫狂与惑者，圣王之戒也 ^②
新书	知恶而不改 谓之惑；故夫狂与惑者，圣王之戒也 ^③

案：准上所见，贾谊《新书·大政上》与《鬻子·曲阜鲁周公政甲第十四》有互见处，文字亦大抵相近。《新书》“夫狂”二字，四部丛刊本作“狂夫”，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则作“夫狂”，今本《鬻子》及《群书治要》卷 31、《意

林》卷 1、^④《太平御览》卷 739^⑤所引《鬻子》俱作“夫狂”，《新书校注》亦以为“原‘夫狂’倒，兹据李本乙”。^⑥是以四部丛刊本《新书》之误文可据《鬻子》而正之。

又《太平御览·疾病部》卷 739 引《鬻子》此文，大抵与今本《鬻子》相同，可知今本《鬻子》当仍唐前旧本。《群书治要》为唐初典籍，《意林》材料更或来自六朝，黄云眉谓《鬻子》乃唐代依仿《新书》伪撰，此说殆误。

例二：《鬻子·慎诛鲁周公第六》与《新书·大政上》

鬻子	昔者，鲁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，戒之曰：“与 杀不辜
新书	诛赏之慎焉，故与其杀不辜也
鬻子	宁失 有罪 。
新书	宁失于有罪也。故夫罪也者，疑则附之去已；夫功也者，疑则附之与已
鬻子	无有无罪而见诛，无有有功而不赏 。戒之 ！ 封
新书	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，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。戒之哉！戒之哉
鬻子	诛赏之慎焉 ^⑦
新书	诛赏之慎焉 ^⑧

案：此例为贾谊《新书·大政上》与《鬻子·慎诛鲁周公第六》之互见部分。《鬻子》“与杀不辜，宁失有罪。无有无罪而见诛，无有有功而不赏”，句意较为完整；《新书》于义较烦。二书并言“罪”与“功”，其中“有罪”、“无罪”、“有功”俱见二书，惟《新书》多“故夫罪也者”、“夫功也者”二句。此外，《新书》

“无”、“毋”二字并用，而《鬻子》俱作“无”，用字较《新书》统一。

又《艺文类聚》卷 23、《太平御览·人事部》卷 459 引《鬻子》此文亦与今本《鬻子》文字相近。

①陈自力《逢本〈鬻子〉考辨》，《广西大学学报（哲社版）》2000 年第 22 卷第 1 期，第 67-68 页。
②鬻熊撰、逢行珪注、钱熙祚辑《鬻子》，上海博古斋，1922 年，第 4a-b 页。
③阎振益、锺夏《新书校注》卷 9，北京中华书局，2000 年，第 339 页。
④案：马总《意林》约成于唐德宗贞元二（786）或三年，其书实本于南朝梁庾仲容所撰《子钞》，今《意林》有柳伯存序，谓《意林》“因庾仲容之抄略，存为六卷”。然则《意林》所引《鬻子》，当出于六朝之旧。
⑤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鬻子》曰：“昔鲁周公曰：‘吾闻之于政也，知善不行者谓之狂，知恶不改者谓之惑。夫狂与惑者，圣人之戒也。’”（李昉等：《太平御览》卷 739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60 年，第 5a 页。）
⑥《新书校注》，卷 9，第 343 页。
⑦《鬻子》，第 8a-8b 页。
⑧《新书校注》卷 9，第 339 页。

《艺文类聚》亦初唐类书，此引《鬻子》与今本相近，复证黄云眉所言非是。

例三：《鬻子·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》与《新书·大政下》

鬻子	圣人在上，贤士百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无有也
新书	故圣王在上位，则士百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无有也
鬻子	王道衰微，暴乱在上，贤士千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比肩也 ^①
新书	故王者衰，则士没矣。故暴乱上位，则千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比肩也 ^②

案：此例为贾谊《新书·大政下》与《鬻子·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》之互见部分。贾谊《新书》诸句由“故……则……”句式所构成，于义较

足，《鬻子》则多所残缺。《鬻子》“则犹无有也”、“则犹比肩也”二句仍有“则”字是其证；《新书》“故”字亦当《鬻子》所有，惟今本《鬻子》残脱而已。

例四：《鬻子·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》与《新书·大政下》

鬻子	政曰：民者，贤不肖之杖也，贤不肖皆具焉。故贤人得焉
新书	夫民者，贤不肖之材也，贤不肖皆具焉。故贤人得焉

案：此例为贾谊《新书·大政下》与《鬻子·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》之互见部分，乃二书篇幅最长之互见重文。贾谊《新书》“贤

不肖之材也”句，卢文弨云：“材，别本作‘杖’，同《鬻子》。”^③可知卢氏对校《鬻子》作“杖”者。俞樾校勘《鬻子》云：“此‘杖’字无义，乃‘材’字之误。盖贤不肖皆空名，必附乎人而后某人贤某人不肖乃实有所谓，是民者贤不肖之材质也。汉人书‘材’字或作‘村’，因误为‘杖’耳。”^④俞氏解说有理。今贾谊《新书》作“材”是其证。

鬻子	不肖人休焉；杖能侧焉，忠信饰焉。民者积愚也，虽愚
新书	不肖者伏焉；技能输焉，忠臣饬焉。故民者积愚也，故夫民者虽愚也

又贾谊《新书》“不肖人伏焉”句，“伏”字《鬻子》作“休”，《贾谊新书逐字索引》谓《新书》“作‘伏’

为长。此文以‘得’、‘伏’、‘饬’为韵，作‘休’则失韵矣。”^⑤此说可从。

又《鬻子》“杖能侧焉”句，钱熙祚云：“此句费解，当依贾谊《新书》作‘技能输焉’。‘技’与‘杖’，‘输’与‘侧’，皆形似而误。逢注乃以‘恃能矜智所至危僻’释之，甚为荒谬。然可见逢氏之前，此书流传已久，展转传写，故有此误。书有显然之误而不可擅改者，此类是也。”^⑥俞樾则云：“此‘杖’字亦‘材’字之误，‘侧’字未详。贾子《新书·大政篇》作‘技能输焉’，恐亦未是。”^⑦相较二说，大抵钱说近是。前文“贤人”、“不肖”对举，此处忠臣亦当与技能对举。《新书》作“输”者于义较明，有灌输教育之意，盖指贤人施教，使百姓有办事之能。

鬻子	明主撰吏焉，必使民兴焉。士民与之，明上举之
新书	明上选吏焉，必使民与焉。故士民誉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归而誉之
鬻子	士民若之，明上去之。故王者取吏不忘，必使民唱
新书	故士民苦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非而与之。故王者取吏不忘，必使民唱
鬻子	然后和。民者，吏之程也，察吏于民，然后随。政曰：民者至卑也
新书	然后和之。故夫民者，吏之程也，察吏于民，然后随之。夫民至卑也

又贾谊《新书》“明上选吏焉”句，卢文弨云：“‘选’，《鬻子》作‘撰’。”^⑧可知卢氏亦据《鬻子》校勘《新书》。“选吏”即选择官吏之意，取意较“撰”为佳。

又贾谊《新书》“必使民

①《鬻子》，第3a页。

②《新书校注》卷9，第348页。

③《新书》卷9，台北艺文印书馆据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影印，1958年，第7b页。

④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卷1，第1页。

⑤刘殿爵《贾谊新书逐字索引》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65页。

⑥《鬻子》，校勘记，第2页。

⑦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卷1，第2页。

⑧抱经堂校定本《新书》卷9，第7b页。

与焉”句，《鬻子》“与”作“兴”。刘师培云：“案：‘与’，《鬻子》作‘兴’，当从之。‘兴’即《周礼》乡大夫‘兴贤’、‘兴能’之‘兴’。”^①李尔钢云：“与，《鬻子》作‘兴’，误。与，参与。”^②此承上文，谓明主善择官吏，且使百姓参与其事。刘师培谓“与”当作“兴”，若据《周礼·地官·乡大夫》所言，“兴”有“举”之意。倘就古代社会情况而论，贤主选取官吏，乃使百姓举荐，于理更为可取。

又《鬻子》“士民与之，明上察之；士民苦之，明上去之”，《新书》作“故士民誉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归而誉之；故士民苦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非则与之”。《新书》以三句为组，而《鬻子》则为两句。《新书》“见归而誉之”句，卢文弨校本“誉”作“举”，卢氏云：“‘举’，建、潭本讹作‘誉’，今从别本。《鬻子》同。”^③是卢氏校改《新书》，先以《新书》别本为据，复以《鬻子》为证也。《新书校注》亦云：“举，原讹‘誉’，兹据《鬻子》、程本改。”^④说与卢氏相同。又《鬻子》“士民若之”句，俞樾以为“若”字当从《新书》改作“苦”字，^⑤其说可从。

鬻子	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所爱。故十人爱之，则十人之吏也
新书	使之取吏焉，必取而爱焉。故十人爱之有归，则十人之吏也
鬻子	百人爱之，则百人之吏也；千人爱之，则千人之吏也
新书	百人爱之有归，则百人之吏也；千人爱之有归，则千人之吏也
鬻子	万人爱之，则万人之吏也。故万人之吏，撰卿相矣 ^⑥
新书	万人爱之有归，则万人之吏也。故万人之吏，选卿相焉 ^⑦

又《鬻子》“十人爱之”、“百人爱之”、“千人爱之”、“万人爱之”诸句，《新书》并作“十人爱之有归”、“百人爱之有归”、“千人爱之有归”、“万人爱之有归”。三处句式相同，而《新书》皆增“有归”二字。

又《新书》“选卿相焉”句，卢文弨亦取《鬻子》校勘，并云：“别本‘选’作‘撰’，

《鬻子》作‘撰卿相矣’。”^⑧据卢氏所言，可知《新书》别本文字与《鬻子》同。《新书》引作“选”，于义较佳，意谓九卿丞相从官吏万人之中选出。

例五：《鬻子·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》与《新书·修政语上》

鬻子	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，学黄帝之道而常之 ^⑨
新书	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，学黄帝之道而赏之 ^⑩

案：此例为贾谊《新书·修政语上》与《鬻子·数始五帝治天下第七》之互见部分。贾谊《新书》“学黄帝之道而赏之”句，俞樾云：“‘赏’读为偿。《广雅·释言》：

‘偿，复也。’”^⑪王耕心云：“卢本‘常’作‘赏’，《鬻子》如文是也。今改正。常者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也。俞别有说。非。”^⑫刘师培亦以为当从《鬻子》作“常”，其说可从。^⑬俞氏所论于古籍中罕寻证据支持，故其立说成疑。王、刘二说则是。“常”、“赏”二字古来声音相近，于义可通。李尔钢《新书译注》亦云：“按《鬻子》‘赏’作‘常’，是。”^⑭言之诚是。

①刘师培《贾子新书斟补》，载《刘申叔遗书》卷下页10b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总页1001下。

②李尔钢《新书全译》卷9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03页。

③抱经堂校定本《新书》卷9，第7b页。

④《新书校注》卷9，第354页。

⑤俞樾《诸子平议补录》校《鬻子》“上民与之，明上举之，士民若之，明上去之”句云：“此‘若’字是‘苦’字之误，其意言民之所与，上则举之；民之所苦，上则去之，文甚明白易晓，且‘与’、‘举’、‘苦’、‘去’皆一韵，此四句乃有韵之文。‘苦’误为‘若’，不特失其义，且失其韵矣。《贾子·大政篇》：‘故士民誉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归而举之；故士民苦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非而去之。’其文与此相同，正作‘士民苦之’。逢行珪不能据以订正，而依误字为说，陋矣。”（《诸子平议补录》卷1，第2页。）

⑥《鬻子》，第3b-4a页。

⑦《新书校注》卷9，第349页。

⑧抱经堂校定本《新书》卷9，第8a页。

⑨《鬻子》，第5a页。

⑩《新书校注》卷9，第359-360页。

⑪《诸子平议》卷28，第335页。

⑫《贾子次诂》卷9，第25a页。

⑬《贾子新书斟补》，载《刘申叔遗书》卷下，第11b页，总页1002上。

⑭《新书全译》卷9，第413页。

从上举各条可知,《鬻子》确与《新书》有着重文互见之关系,前人以为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之关系,仅在〈修政语下〉“鬻子曰”各条,未免流于粗疏;复以“鬻子曰”诸条不见贾谊《新书》而谓两书皆伪,尤堪商榷。校勘学者指出《鬻子》有与贾谊《新书》相合者,当为实事。后人考证《鬻子》真伪,只举出《新书》中“鬻子曰”各条不见于今本《鬻子》,因而推断今本《鬻子》为伪,其说皆有未备。其实今本《鬻子》散见于《新书·大政上》、〈大政下〉、〈修政语上〉诸篇,前人所谓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未有相对应者,恐未必然。

今本《鬻子》虽有残脱,然若因而推断其为伪书,则未免过于武断。今本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有着重文互见之关系。刘殿爵尝论及重文互见之重要性:

同一段文字在不只一种古代典籍中互见是常有的现象。因为古代典籍经过长期的传承,残阙讹错在所不免,所以用互见的文字绝长补短,拼合成篇,文字往往可以比较完整。^①

若能充份利用互见重文以校改《新书》、《鬻子》,二书之互见关系自然不难发现。辨伪学者倘能利用校勘《鬻子》与《新书》之成果,讨论二书之真伪亦更多所凭证,结论必定更为可信。

总之,今本《鬻子》非但有与《新书》相合者,其互见之迹更是昭然可考。虽未能单凭此点论定《鬻子》非伪书,然而诸家推论《鬻子》为伪之过程却有可商之处。黄云眉尝云:

今本《鬻子》,如《四库提要》所言,唐以来依仿贾谊所引,撰为贗本,则毋宁谓今本《鬻子》,与今本《新书》,皆唐以来人所依托,而其有心相避,或者竟出于一手,亦未可知也。^②

以为《新书》为伪,其说虽非始于黄氏,惟若因二书文字互不相见,因而推断皆为唐人伪撰,此说尤不足称信。若二书终是有意相避,《鬻子》文字何以见于《新书·大政》、〈修政语〉等篇章。其实,汉世文人著书,每有因袭前人,贾生博通诸子百家之书,“年十八,以能诵《诗》属《书》闻于郡中”,^③则其书有与《鬻子》相合者,亦不足奇。

三、结 语

准上所论,有关贾谊《新书》与《鬻子》之互见关系,可总结如下:

首先,前人论断《鬻子》真伪,多据其与贾谊《新书》之互见关系,指出《新书·修政语下》七条“鬻子曰”不见今本《鬻子》,便谓《鬻子》为伪书。据本文考证,二书实有互见重文关系。惟《鬻子》罕人研习,渐告散佚,只剩今本《鬻子》残书十四篇。惟隋末唐初类书亦多征引《鬻子》,可证今本《鬻子》成书当早于六朝,绝非唐人所伪撰。黄云眉以为成于唐代,其说并不可信。

其次,前人论证《鬻子》真伪,多以《列子》及贾谊《新书》所引“鬻子曰”不见于今本《鬻子》为证,循而推断今本《鬻子》为伪,此论尤其未备。诚然,《列子》及贾谊《新书》所引“鬻子曰”不见今本《鬻子》;惟《新书》不题曰“鬻子”者,却有五处文字与《鬻子》可作逐字排比读。岂非标明“鬻子曰”者方为《鬻子》旧文,暗用其文者则不足称?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谓“谊书所引,则无一一条之偶合”,其说未必尽然。论者考证《鬻子》真伪,亦宜以文本对读,复利用校勘学之成果,细意勘证,方始为功。

(责任编辑:石磊)

①刘殿爵《〈夏人歌〉的拼合尝试》,载刘殿爵《语言与思想之间》,香港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,1993年,第149页。

②《古今伪书考补证》,第120页。

③司马迁《史记》卷84,北京中华书局,1982年,第2491页。